

斗争之路

——米高扬回忆录——

供内部参考

А. И. Микоян
ДОРОГОЙ БОРЬБЫ
Книга первая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осква, 1971
根据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 1971 年俄文版译出

斗 争 之 路
——米高扬回忆录 一
〔苏〕阿·伊·米高扬著
北京外国语学院俄语系 1972 年毕业生译
*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新华书店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25.375 印张 464,000 字
1975 年 11 月第 1 版 197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书号 3002·167 定价 2.35 元
(内部发行)

出版说明

本书是阿·伊·米高扬回忆录的第一卷。

阿·伊·米高扬是苏修叛徒集团的重要头目之一。他于一九一五年在梯弗里斯（今称第比利斯）加入共产党，一九二三年起被选为中央委员；一九二六——一九三五年被选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候补委员，一九三五——一九五二年为政治局委员；历任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对外贸易部长等职；在赫鲁晓夫修正主义集团篡权后，曾任苏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在勃列日涅夫集团上台后，由于苏修叛徒集团内部相互倾轧的结果，自一九六五年十二月起改任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委员；一九六六年苏共二十三大上降为中央委员；一九七一年苏共二十四大时，除被选为苏共中央委员外，不再担任其他职务。

这卷回忆录于一九七一年出版，叙述了作者在童年时代、十月革命前和一九一七——一九二〇年在南高加索的经历和活动。

作者在书中极力吹嘘自己，把自己打扮成为一贯正确的马克思主义者。为了适应苏修叛徒集团的需要，作

者还在一些地方借机攻击斯大林。

本书对研究米高扬其人及南高加索现代史提供了一些材料，现译出，内部发行，供有关方面批判和参考。

目 录

作者的话.....	1
成长.....	5
童年时代的回忆.....	5
革命的少年时期.....	36
“我的大学”.....	61
二月革命时期.....	100
准备武装起义.....	144
在巴库公社的日子里.....	170
苏维埃政权在巴库的胜利.....	170
公社的初期活动.....	190
武装斗争在继续.....	215
巴库公社的失败.....	236
我们离开是为了胜利归来.....	281
他们是二十六个人.....	306
在里海以东地区的监狱里.....	338
在克拉斯诺沃斯克.....	338
在阿什哈巴德.....	370
在英国占领下的巴库地下活动.....	413
争取群众的斗争.....	413
为实现南高加索工人的联合而斗争.....	458

“为苏维埃阿塞拜疆而斗争”这一口号的诞生·····	491
南高加索第一次党代表会议·····	511
给列宁的一封信·····	565
革命的骑士·····	589
统一战线的策略·····	622
又一次被捕·····	670
阿塞拜疆共产主义组织的联合·····	694
莫斯科·····	723
南高加索苏维埃的诞生·····	767
由莫斯科返回巴库·····	767
再见了，巴库！·····	786

作 者 的 话

我很早就注意到，人越是上了年纪，他就越是强烈地感到有必要对以往的生活作某些总结，以便把积累起来的经验和知识传给接替我们的后代。这是自然而然的、合乎规律的。对于那些在发生重大社会、政治变革的时期里度过自己人生道路的人来说，更是如此。

半个多世纪以来，我是我们生活中许多事件的一个见证人和参加者。我有机会接触不少非常有趣的人物。我到过世界上许多国家，会见过这些国家的政府领导人、社会政治活动家、文化界人士和其他人士，以及许多普普通通的人。我同我们党和国家的许多杰出的活动家多年在一起共事。当然，我个人和列宁的多次见面以及我有幸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是我一生中最大的幸福。

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不免感到有些胆怯和疑虑。

我不是作家，我写的也不是文学作品，只不过是真实地叙述我自己一生中所目睹和所参加的一些事件，以及同我一起工作过和我所接触过的一些人物。在那些年代里我们大多数人还是青少年。一般说来，在发生重大的、激烈的社会变革和动荡的时代里，青年的成长是特别迅

速的。在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年代里，往往十四五岁的男女青少年就参加了革命斗争。他们的才干增长得很快，到十八、二十岁时就成了成熟的政治工作人员，甚至成为领导干部。

我写的是回忆录，不是历史；写历史应该是对社会生活的全部事实和事件进行全面的、深入的科学分析。我并不奢求对本书所涉及的事件进行那种系统的、尤其是全面的描述，因为我没有给自己提出这样的任务。

我再说一遍，这本书只是回忆我个人经历过以及看见过和听到过的事情。除此以外，我没有别的什么要求。

在那些遥远的、急风暴雨般的革命年代里，我们通常是谁都不写日记的，哪怕是对所发生的许多事件、无数次的会见和谈话的简单记录都不作的。我们大多数人不仅没有保存本人的演说稿，而且连演说提纲也都没有保存下来。那时我们通常是不写这些东西的，因为发表演说不是照稿宣读，而是跑到就讲，经常是即席讲话。只是在发表极其重要的演说时，才拟一个简短的草稿或提纲，即使是这样的草稿也几乎都在演说之后就立即销毁了。起初我们没有女速记员，记录经常是由文化程度不很高的人作的，记下的不一定是主要的东西，而是次要的东西。一个小时的报告只作一小页记录，而且还不总是准确的。无论如何，现在要使用这些记录是困难的，虽然这些记录也有助于回忆以往经历的某些细节和事实……

当时我们没有“为了写历史”而把那时的文件和资料

收集保存起来，这一点我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

我记得当我最初读完了列宁的名著《国家与革命》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书里列宁所写的跋。列宁写道，发表了这部著作后，他已经拟定了该书的下一章的大纲。可是除了题目以外，连一行字也没有来得及写，因为1917年十月革命前夜的政治危机“妨碍”了他。列宁写道：“对于这种‘妨碍’，只有高兴。”他说：现在“做出‘革命的经验’总比论述‘革命的经验’更愉快，更有益。”^①

我们不能很快看到列宁这部著作的新章节，自然是十分遗憾的。可是，我记得很清楚，列宁所描写的情绪，当时对我们很多人来说是十分亲切的，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我的回忆录，其实也正如其他任何回忆录一样，不可避免地带有主观片面性。书中叙述的那些事件，我记得是什么样，以及在当时那些遥远的日子里我是如何领会认识的，我就叙述成什么样。在叙述过程中我顺便也讲讲自己现在对其中某些事件的态度。

我是以一个参加者或目击者的眼光，而不是以一个历史学家的眼光来看待所叙述的事件的。这就是为什么我对于与我本人密切相关的某些事实和事件较之其他事件——从历史学观点看来可能是更为重要的事件——重视得多的缘故。我本人没有直接参加或亲眼看见的、当

^① 《列宁选集》第3卷第276页。——译者

时给我印象不深的或者根本就与我无关的事件，在本书中只作简单扼要的描述，或者根本不写入回忆录。在南高加索当然有很多杰出的人物、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党外工人政治积极分子。他们中间的许多人我在回忆录中举出了他们的名字，但是另一些人在本书中则连提都没有提到，虽然这些人无疑是完全应该提到的。过了半个多世纪的时间，我现在不可能把所有这些人的姓名都记住。

一般说来，一部回忆录，如果记述真实的话，在我看来其价值首先在于它给读者提供了当时人们所目睹的具体的历史资料。这正是我们的回忆录所能给予读者的主要益处。

因为这是个人的回忆，所以作者的名字在文中出现的次数相当多，尽管我尽力不超越客观地反映生活真相所必需的范围。况且，据我看来，个人的机缘、个人的感受，对于广大的读者不是没有兴趣的，他们一般都希望知道许多历史事件的直接参加者是怎样认识这些事件的，他们是怎样看待这些事件的，他们当时想些什么，他们又是以什么来指导自己的行动的。所有这些，不仅有助于人们对许多事实和事件的本身了解得更加清楚，理解得更为深刻，而且还有助于人们对这些事实和事件当时发生的环境、当时人们的心情、当时人们的期望和宿愿、快乐和忧愁等等有一定的了解。

如果读者在我写的这本回忆录中能够得到这些东西，那我就有理由认为我的目的达到了。

成 长

童年时代的回忆

家庭和父母；学校；到梯弗里斯；入教会中学。

关于幼年时期，我首先回忆起的是一些零星的片断。有时甚至感到不太理解，对年代久远的许多事情，我怎么能没有记住一些别的，而恰恰是下面这些呢……

我清楚地记得我的故乡萨纳英，在亚美尼亚的一个风景如画的地方。

……在狭谷两侧陡峭的山岩上分布着几大片上百公顷可耕的山地。在这些山地后面，耸立着丛林密布的群山，而在群山和丛林的后面，则是一望无际的高山牧场。漫山遍野绿草丛生，山花到处可见。

我们的村庄就在山坡下，紧挨着山地。我还记得村里的那些栉比相邻的小房子……

在我的童年时期，这里曾是沙俄辽远的民族边区许多落后的村庄之一。没有文化，没有权力，任人欺压的……

下面一件事就足以说明这一点。那时我们全村只有两个识字的人，而且是当地修道院的神父和修道士。其

余的人全是文盲(我的父母当然也不例外)。他们连什么是真正的学校，什么是教师和教科书都弄不清楚，至于什么是报纸或者杂志那就更不用提了。……

我就在这里出生，并在这里度过了我的童年。我们米高扬一族很久以来就生活在这个村子里，并且住得很“紧凑”。我们和格沃伯伯两家合住在一座小房子里。小房子共有两间屋子、一个地下室和一个凉台。紧挨着我们的房子，有一个半截露出地面的小屋，住着我的祖母瓦尔季捷尔和我的一个叔叔瓦尔坦。在我们的房子前面，沿着山坡有两座不大的房子，房顶连在一起，这平平的房顶也就是我们的“院子”。那里住着格里沙伯伯和维利汉伯伯。靠他们家下边一点住着姆克尔季奇伯伯，再稍远一点住着基戈尔叔叔……

不知为什么我记住了这样一件事。有一次我一个人，在房顶上玩。

我想出了玩“磨面”的游戏：头朝下俯躺着，用手抓起屋顶上的土往下撒，这样就好象面粉从真的磨上洒落下来一样……

这个游戏使我特别着迷，根本没有察觉身子顺着房顶往下滑，一下子滑落下去摔了个倒栽葱。我的脸碰到了地上，鼻子也碰破了。我又害怕又疼，就大叫起来，向母亲跑去。母亲给我擦了擦鼻子，结果平安无事。

看来，我所以想起来玩“磨面”的游戏，是因为几天前

父亲曾带我到真的磨坊去过。我们的村子在一块高地上，两个村子合用的磨坊却在峡谷里。磨是个小水磨。为了磨一口袋粮食，我和父亲在那儿呆了一整天。后来又有一次我们是头天晚上去，第二天早上才回来。我还记得，那里有许多农民，他们坐在装粮食的袋子上，等着轮到自己……

我六、七岁时，有一次我和堂兄弟们在院子里玩。当时正是秋天，傍晚时天气凉起来了，于是我们就到维利汉伯伯家去。他家里有一个炉灶，炉灶前低挂着一个小白铁灯。不知是哪个小孩不小心碰掉了点着的灯，灯掉在我的堂弟——格里沙伯伯儿子的身上。一刹那间煤油洒了他一身。顿时他全身着了火，在屋子里乱跑。我们吓得向街上跑去。满身是火焰的堂弟在前面跑，我们跟在他后面拚命地叫喊着。

我们跑得很快。风把火焰吹起来了；就象一个大火把在街上移动一样。这孩子的烧伤非常严重，皮肤全都烧黑了。因为没有医生，几小时以后他就死了。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可怕的印象。事后这个活的火把还久久地在我的眼前晃动……

通常在秋天我的父亲去树林砍柴，准备过冬用。有几次他带我去了。去的时候，他让我骑在毛驴上——这是当时我们家唯一的运输工具。骑在这匹“马”上，我当然快活极了。在树林里我帮助父亲捡干树枝。回来时就

只好步行了。

我记得父亲带我到遥远的森林里去的情景：那里长着许多野苹果树和野梨树，我们从清早一直到晚上都采摘果子，装到筐里，然后驮在挺能耐劳负重的小驴上……

我和母亲经常到离家不远的树林里去摘石枣。我兴致勃勃地爬上树帮母亲摘。我们常常能摘很多石枣。

我还记得我和邻居及亲戚常去暖和的狭谷采核桃的事情。狭谷的树林里，沿着河岸长着许多高大的核桃树。比较灵巧的小伙子往往爬到树上用木棍打核桃，我们这些小孩子就在石头缝里捡。采到的核桃然后按家分。到傍晚的时候才回家。

从8月底我去梯弗里斯^①上学以后，就不再参加这些活动了，而大自然的这些礼物通常是在9—10月采摘的。

我记得除了食用新鲜的石枣以外，大部分我们把它晾干，冬天煮成大家都爱吃的果子汤。野梨和野苹果一般腌在桶里留到冬天吃。其中一部分晾干，大部分野果用来作果烧酒。

我回想起来，当天刚蒙蒙亮，我们大家都还睡在床上时，父亲就起来了。他走近窗台，那里放着母亲给他准备的简单的早饭：面包、干酪，还有一点烧酒。他倒一小杯酒，吃一点就干活去了。我不记得父亲喝醉过。甚至作

① 今称第比利斯。——译者

客或参加婚礼时，他也不过只喝一两杯。我的哥哥和母亲完全不喝酒，我们小孩子就更不用说了……

1905 年秋天，随着革命的开始，农民起义的浪潮波及到我们地区的一些村庄。农民开始夺地主的土地。后来这一浪潮也波及到我们村子。但是占有这块土地的阿尔古京斯基公爵一家的势力很大。因此我们村子里的农民一直没下决心夺地。而且不久沙皇当局就从哥萨克步兵中调来了讨伐队。

讨伐队起初出现在别的村子，并且开始进行镇压。在邻近的阿赫帕特村，不仅夺回了土地，而且逮捕了许多农民积极分子。

哥萨克步兵也到我们村来了。他们驻扎在村边。农民们，特别是妇女，都极力避免被他们看见。而我们小孩子却对他们很感兴趣，充满好奇心。一次，我们鼓足勇气，去看看他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

我们胆怯地向他们走去。他们支起帐篷，在那里升火做饭。我们变得更大胆了一些，走近他们的跟前。出乎我们意料之外，这些哥萨克人没有赶我们走，也没有骂我们。因为我们不会讲俄语，所以没法跟他们搭话。

过了一天讨伐队就开走了。

记得 1906 年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亚美尼亚的一个主教平日在梯弗里斯主持教务，但常到古老的萨纳英修道院的别墅来。他劝巴库某亚美尼亚石油企业主出资修

建一条经过陡峭的山坡通往我们村子的好走的路，以便四轮马车畅行无阻。那时我们农民没有四轮马车，当然也就不需要这样的路，只有主教自己才需要这样的路。后来为了修建这条路花了将近六、七千个卢布。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我们村的许多农民都参加了修路。

1906年夏天路修成了。不知从哪儿听说，“我们的大恩人”——石油企业主第二天将从巴库乘火车来，要我们村子出一辆好的大车，载着这位贵客在新修的路上走一趟，因为贵客想亲自看看这条路。

次日，我们小孩子和村里的许多居民在修道院的院子里等待客人。在修道院里为客人准备了一个房间。大车进了院子时，我们看见了这个“大恩人”，立即哎哟了一声。这个人个子很高，年纪已经不小了，身体胖得出奇，而且是个瘫子。

客人到后，没有立刻把他送到预先准备好的房间里去，忽然从人群中走出一个农民，他面向人群（这些人显然是事先安排好的）嚷道，还有一部分修路工钱没有付清，他们为此张罗奔走而没有结果。他提议把“大恩人”绑在树上，直到他给巴库打电报让把所有应付的钱送来才放他。

马车停在泉口附近，旁边长着一棵大的老梨树。“客人”要说点什么，但是没让他说。六、七个农民吃力地把他抬起来，用绳子绑在树上。

他开始解释起来，声称他并无恶意，他一点儿也不知

道有欠债的事，相反，他以为所有的钱都付清了，并且还期待着村里的人们将很感激地接待他呢……

农民们根本不相信他，立刻喧哗起来。

倒霉的企业主只好让跟他来的一个人给巴库打电报。他被绑着，签了字。此后他哀求给他松绑，让他在什么地方躺一躺。农民们决定给他松绑，把他送到一个房间里去，但在没有收到钱之前不放他出村。事情果然是这样做的。

过了一天钱送来了。包工头全部付清了农民的钱，而“大恩人”急急忙忙地滚回去了。

农民们因为得到了胜利而兴高采烈。

这条路我们村用了六十年。说实在的，我们很少用它。有了小汽车和公共汽车以后，这条沿着陡峭的山走的路，又有许多急转弯，就明显地不适用了。直到 1966 年才修建了另一条适合于小汽车和公共汽车通行的很好的柏油马路，来往运送家住山地农村，而在狭谷的炼铜厂工作的工人们。

我再说一件事，它可以使人了解当时农民的心理。

那时候筑路由农民服劳役。干这种活不给钱，因此，农民常常千方百计地逃避它。

有一次下了通知：这个星期天所有能干活的男子都要去修整道路，路段——从我们村到火车站，约三公里长。那时我大约九岁，但我请求父亲带着我去。我们带上铁锹就去了。